

最后的晚餐

沈昌文



EX LIBRIS

JOHN WHITING FRIEL
HELEN OTILLIE FRIEL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最后的晚餐

沈昌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晚餐 / 沈昌文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80678 - 747 - 2

I. 最... II. 沈...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091 号

最后的晚餐

沈昌文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95,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747 - 2/I·112

定价: 1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题记

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餐。现在把两者的若干记事合编而一，有心人不免得到一个印象：此人莫非是参加当年“最后的晚餐”的犹太人？

也许是吧。

万一有些地方对不上，那也就“将错就错”了吧！

二〇〇七年七月沈昌文谨识

目次

题记	I
费老的最后嘱托	I
汪老的儒行	5
向后看	9
柯灵老人与《万象》	13
荒芜的“荒芜”	16
关于《中国人学英语》	21
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24
读出真正的金克木来	31
清晨的一个电话	36
陈翰伯的一个意见	41
编辑与“好事”	47
陈原的编辑活动	54

陈原的几句外国话	68
从陈原的辛酸说起	72
“品牌”意识首先是原则性	78
陈原先生	83
陈著《总编辑断想》后记	86
界外人读	92
几十年后的话	95
最早的地理课本	101
清理旧物的感想	104
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	107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112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创伤	117
 编辑与饮食	 121
北京菜、苦瓜和诗	124
鲑鱼·洞鱼·鳙鱼	130
带着臭豆腐去旅行	136
多吃虫子	141
吃遍中国	146

北京小吃	149
酒中的糟糠之妻	156
“普京”和“小二”	159
从食素到主义	165
王老教我做菜	169
世界文化视野里的饮食之道	172
“以食会友”考备	175
回到“前现代”去	179

费老的最后嘱托

费孝通老人在世时，同《读书》杂志的关系十分密切，但这同我并没多少直接关系。原因很简单，最早的联系人是冯亦代老人，他和费老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经常见面，有事不必我来操心。后来，张冠生兄为费老作了很好的安排，包括多次去郑州讲演，出席《读书》在那里组织的“越秀学术讲座”。到现在为止，我牢记在心并且感到深深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是费老亲自同我交待，并且再三说明一定要做好的。他当时用英文对我说这事的重要，我印象尤其深刻。

大约在一九九八年中，当年费老大概是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某日，老人忽然约我一谈，他开门见山地对我

说，现在大家都说老人要进行 physical exercise，这对老年知识人说来当然重要，可是很少人想到 mental exercise 对老年人的重要。他把 mental exercise 翻译为“思想操练”。他希望我把在北京的一部分老人组织起来，经常举行“思想操练”。我当场提了一些名字，他大多赞成。特别是李慎之先生，他们原本就熟。李老听说这消息也高兴，他们后来可能还就此说过一二次。慎之老人后来同我通过电话，觉得这可能是目前老人之间对话的最好形式。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举行了第一次“思想操练”，在华北大酒店。地点是我选的，因为据说那里有不错的苏州菜——想必是费老爱吃的家乡菜。活动经费央请企业家欧阳旭先生资助。我经办这类事情从来有过于谨慎的毛病，不敢邀请传媒，更没有做什么会议记录，还是办《读书》杂志的服务日时的老作风——没有主题，没有主持，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可惜，饶是如此小心翼翼，第一次以后，名声还是张扬开去。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思想操练”不得不停顿。打这以后，同费老见面机会也少了。我想再去请问，人们告我，还是不要去惊动老人家的好。



费孝通先生

但是，费老关于 mental exercise 的恳切教导，至今常在我记忆中。现在关于这活动，只在废纸堆里找到当时的活动安排记录一纸，附印在这里。

“思想操练”活动（第一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于华北大酒店）

莅会人士：

费孝通 李慎之 李 锐 蔡仲德

资中筠 陈乐民 庞 朴 王 蒙

龚育之 曾彦修 王若水

本次活动经费由北京国林风书店赞助。国林风书店董事长欧阳旭先生与会向各莅会人士致意。

下述单位向莅会人士赠送书刊：

《一九五七年夏季》《红镜头》各一部——万圣书园赠

《牛津精选》一套拾册——辽宁教育出版社赠

《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六期——《读书》赠

《地理知识》一册——《地理知识》赠

二〇〇五年七月

汪老的儒行

“文革”早期，我当过一个时期“造反派”。

我多年来是单位领导所宠信的人，怎么会去当“造反派”呢？这倒不全是因为自己看到形势陡变，而想投机取巧。一九六六年六月，单位里忽然有人发动了对我的猛烈攻势。六月八日，一位平时非常亲近的革命同志忽然贴出一张长篇大字报，指出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又多年忠实于文化黑线，勒令我交代一切问题。紧张之余，赶紧打听情况，方知文化部里的一位部领导认为我在这个单位的第一把手有大问题，而我是此人所宠信的，于是人们商议后想以我为突破口。可是，后来又一了解，说这位领导近来自身也难保，另有造反派想整他。于是，无奈之余，我立即贴出大字报，

支持这个造反派，并申请加入。这一个小动作，让我免于眼前的巨大灾厄，有了一些安稳日子可过。

这个造反派中大多是新来的大学生。我加入后，他们给我指派一个任务：帮助他们去抄家。我又不是彪形大汉，抄家时又可以干些什么呢？他们有一想法，抄走资派家里的书，什么要没收，什么留下，由我鉴别。这事倒不难，因为“毒草”大多有名单，成问题的作者也往往有名单，大体上办一下，即可。

干了这事，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是：认识不少处理抄家图书的人物。他们有的原本出身书业，说起来也还都熟，于是成了朋友。闲下来时，彼此还常常聊聊书。特别在后期，还能找东寻西地找点古怪的书回家去闲读。到了后来，老干部大多“解放”，我这个副业变得有点小名气了。喜欢书的老干部往往找上门来，托我到那些堆放抄来的旧书的地方去找什么什么他们必需的书。

就这样认识了老干部汪道涵。他在机械工业部，同我从来不相搭界。别人介绍，我去东城汪芝麻胡同他的宅邸专门拜访。谈话的主题，当然是书。他“解放”后又有了一个小孩子，我去时还抱在手里，老先生总是一边逗孩子一边同我谈

书。

汪老是机械工业部的，我以为他不会喜欢什么文科的书。事实不然，老先生不仅谙于文事，而且开口就是洋文和古文，指名道姓要看某某英文书和中文老书。有一天谈得高兴，他大讲莎士比亚，某剧某剧，某某人物，倒背如流。我只记得谈到 to be or not to be 时，我还算懂得，也知出处，插了几句嘴，别的就茫然了。他表示遗憾，现在家里连莎翁的原作都找不到了。老人这一心情，使我马上去雍和宫附近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找朋友，把话说尽，想找一本莎翁原作。屡经翻腾，总算找到一本英文版全集，付书价大洋一元，于是连夜送到汪宅。这一来，汪老甬提多高兴了，又同我说了半天。因为白天我对 to be or not to be 接了嘴，这次他大谈中国和欧美学者的生死观。我实在想不到，一个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会那么钟情莎士比亚的原作，懂得那么多西方哲学观念。

以后，汪老去了上海，当上了更高的官，我自然是难以见到他了。但是，大概在九十年代，上海淮海路六百多号的一个地方要开三联书店门市部，要找领导人剪彩。大家正在无奈之时，我说，同书有关的事让我这北京来的人去找汪老

多半会卖面子。果不其然。我找他秘书一说，汪老立刻同意到会剪彩并讲话。这对我这个出版社的小商人来说是多大的面子！但我知道，他这面子不是给某人，而是给书的。

汪老去世，人们痛惜一位“儒者”的离去。我虽然已多年不见这位老人，但是对他的儒行，我一直是印象极深的。

向后看

李慎之先生去世一年多了，很多人写了悼念文章。我虽然在去年闻讯从国外赶回来，帮助料理一些后事，但文字一点未写。原因很简单，李老是思想家，我退休以后，闲居无事，乐于为他服务而不擅于同他老人家进行思想交流；何况关于他的思想业绩，人们已经写得够多了。

我认识李老是比较早的，大约四十年前，大陆同苏联交恶，出现了“反修”的需要，我被调去编印所谓“灰皮书”、“黄皮书”，也就是只供领导干部看的“帝修反”头面人物的“反动著述”。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还算开明，交待我如有语言上、理解上的难题，可向新华社等单位的一大批“摘帽右派”请教（当时的提法是：“废物利用”，自然不能用“请教”

字样)。我由是认识了这些“右派”知识人的大头头李慎之，以及董乐山诸位前辈。李老当年虽然遭厄，我虽然名为某个中央机构派去治事的干事（自然只是个小干事而已），但他对我说话做事仍然气势不凡，一无低声下气、自认“废物”的样子，何况事事说得在理，自然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更不断请益。我退休以后，自愿为他办一些杂事。例如，有一度，他所在的单位作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写的文字可以依然由有关秘书部门打印（他身居领导，九十年代后职位没有了，地位未变），但只能交他一两份打印件，不能多印。可李老交友广阔，不够用，怎么办？此类小事，我最乐意效力：上街十分钟，不是全都解决了吗？

李老对出版极其关心，常常同我谈些有关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在吸收西方文化时，要“向后看”。他认为西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文明，我们还了解得很少，特别在人的解放和启蒙这些问题上。我们只在低级层次上，例如女同志可以同男同志坐在一起聊天，有所改变，这是一百年前办不到的。但从根本上讲，我们没有在人的解放这方面真正学习到西方多少东西。他同我说，这些他也是近几十年逐步认识到的。一九四九年刚进城时，他认为已经解放得不